

贫困国家的儿童教育

Arye L. Hillman
Eva Jenkner



贫困国家的儿童教育

Arye L. Hillman
Eva Jenkn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

丛书编辑

Asimina Caminis

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

封面设计和排版

Massoud Etemadi, Julio R. Prego和基金组织多媒体服务处

ISBN 1-58906-345-7

ISSN 1020-8399

2004年3月出版

订购基金组织出版物，请联系：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 623-7430 传真：(202) 623-7201

电子信箱：publications@imf.org

互联网址：<http://www.imf.org/pubs>

前言

儿童有权受到免费的优质基础教育。认识到这一权利，世界领导人把在2015年前普及初等教育列为“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在2004年，对于许多贫困国家来说，这一目标似乎无法实现。入学率远非百分之百（特别是女孩），许多儿童在完成初等教育前辍学。由于教师没有受到良好培训、报酬过低，教室过于拥挤，课本、黑板、笔和纸等基本教学工具匮乏，许多上学的儿童并未得到适当的教育。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政府缺乏资金或政治意愿来满足其公民的教育需要。对此，一些低收入国家的贫困家长自己组织和支付其子女的教育。学校收费和其他用户付费对一些家长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但是，鉴于另一选择（儿童根本得不到教育），这些付费可能是对这一问题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法，虽然不太理想。

《经济问题第33号》考察了这一重要问题。Michael Treadway根据Arye L. Hillman和Eva Jenkner的“在低收入国家对基础教育的用户付费”（基金组织工作文章02/182，2002年11月）编写了本文，可以在www.imf.org/pubs上免费获得该工作文章。这份工作文章提供了入学趋势统计、关于公平—效率问题的理论、案例分析和全套参考书目。Hillman教授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公共财政和公共政策：政府的责任和局限》（英国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对教育和其他公共政策选择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

贫困国家的儿童教育

在理想世界中，初等教育是普及的并由公共出资，所有儿童都能够上学，无论他们的家长是否能够或愿意付费。原因很简单：如果儿童未能获得作为一个有生产能力的、负责的社会成员所需的基本技能，则整个社会将受到损失，更不要说这个儿童。不教育儿童的代价远远超过教育儿童的花费。缺乏基本技能的成人更难找到报酬良好的工作并摆脱贫困。对女孩的教育具有特别显著的社会收益：受过教育的妇女收入更高，母婴死亡率更低，在做出选择方面也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

尽管在过去20年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入学率远未达到百分之百。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03年底全球大约有1.13亿儿童没有入学。

由于基础教育是公认的权利，并且儿童受教育有益于社会，国家应负担费用，特别是贫困儿童的费用。然而，在许多贫困国家，国家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政府可能没有资源来普及免费教育，原因要么是存在大规模的不纳税的影子经济并且税基很小，要么是税收征管无效。而且，在许多国家（往往是同一些国家），国家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所掌握的资源。资金管理不善、低效率或公开的腐败可能使资源无法流到学校。在非民主社会，如果统治精英害怕受过教育的民众将更能够挑战他们的话，还可能缺乏普及教育的政治意愿。虽然纠正这些缺陷显然是一项重点，但是，这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贫困国家的贫困儿童受到教育呢？

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调查的79个国家中，有77个国家家长为基础教育付费很普遍。用户付费可以采取不同形式。学校收费可以用来支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资、铅笔和课本等材料以及学校的维护。家长也可以用实物付款，例如，为教师提供食品、在教室提供帮助或为学校建设或维护出力。重要的是检查在贫困国家对教育的这种用户付费的效果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应该继续、改革还是禁止它们。



贫困国家的教育成就

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东亚和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些地区的入学情况反映了它们的经济业绩。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迅速增长的东亚，1997年小学的入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99%），比1980年的86%上升了。（这些是净入学数据，定义为在适当的年龄组中在校儿童的百分比；总入学率包括年龄大于其年级通常年龄的儿童，因此可能超过100%。）南亚远远落后，1997年只有77%的儿童入学，但与1980年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1980年净入学率仅为64%。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历不同。虽然没有1997年的数据，但我们知道总入学率在1980年（当时估计为54%）至1996年略有下降。现在很可能为50%左右。

在贫困国家，许多儿童在毕业前辍学。1999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组的完成率（那年毕业年龄儿童实际读完小学的百分比）为73%，东亚为81%，而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50%。这些数字令人沮丧，但它们也代表着改进：1990年的完成率更低。

但是，完成小学并不保证孩子们获得了基本的文化技能。

一些低收入国家的调查证明，许多上过一些学（5-6年或更短）的成人的识字和数学能力就实际可用性而言仍在文盲之列。

同样令人沮丧的是在各国和各地区内部的不同组别之间教育成就的差异。令人悲哀（但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上学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具有普及教育的深厚传统的国家除外。在巴基斯坦，90年代初86%的6-14岁的富裕儿童入学，而贫困儿童只有37%入学，造成49个百分点的贫富差距；在塞内加尔，这一差距为52个百分点，摩洛哥为63个百分点。在孟加拉国、加纳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这一差距小一些，但仍然很大。

性别之间的差异甚至更加令人瞩目。在所有低收入国家，在不上学的儿童中女孩的数字不成比例地高。对女孩的偏见在南亚和非洲特别明显；在其他许多国家，男孩和女孩上学的数字大致相同，在一些国家，男女比率略有利于女孩。

残疾儿童特别处于劣势。估计仅有5%的需要特殊教育的有学习障碍的非洲儿童上学，而如果学校具备适当的设施的话，其中70%可以上学。但是，即使具备更好的设施，家长也可能让残疾儿童去乞讨，而不是让他们入学。



供给和需求不足

鉴于基础教育的明显好处，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这么多儿童未能得到基础教育？根据经济理论，人们显然希望得到的一项商品或服务的缺乏或短缺要么来自需求失灵，要么来自供给失灵。也就是说，存在需求方和供给方障碍。

成本是为为什么对教育的需求可能很低的一个明显原因，

因为贫困家庭必须首先满足其基本需要（食品和住所）。除学费、书籍和学校用品外，可能还有交通和服装开支。如果一些家长可以将费用分摊到几年中，则他们可能能够负担孩子的教育，但是，低收入国家的许多贫困人口得不到信贷。

缺乏对教育的需求，还可能是由于儿童教育的机会成本：家长可能宁愿让他们的孩子工作以补充家庭收入、干家务活或照看生病的家庭成员。在受到艾滋病折磨的非洲国家，儿童可能不上学，而照看生病的家长或成为孤儿的兄弟姐妹。机会成本甚至使一些家庭无法负担免费教育。

人们所认识到的教育的价值也影响对教育的需求。家长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准确评估投资于子女教育的回报，或者，他们可能认为回报太低，没有理由付出这些成本（有时的确如此），或许因为他们可以得到的教育质量低下。他们可能认为在当地就业不需要文化技能，或者找工作更多地靠人际关系而不是靠技能。他们可能感到竞争更激烈的城市工作市场离社区和家庭太远而不考虑。或者，他们可能只是不了解所存在的机会，特别是如果他们本身没有受过教育的话。如果他们生活在轻视教育或不赞成女孩受教育的社区，他们可能不愿违反社会规范。

例如，墨西哥的Progresa项目将上学的成本降低了一半以上，但是，入学率仅提高了10%。在该项目下，中央政府直接付款给村级官员，后者将这些款项分配给女性家长，条件是他们送子女上学并带他们去诊所进行预防性健康护理。这些收入转移相当于负的用户付费。在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对教育的需求不旺并不是由于成本，在克服文化障碍和偏见并解决女孩的机会成本比男孩高这一问题之前，入学情况不会好转。

出于上文列出的原因，可能存在**供给**失灵：政府可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提供教育服务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将资源输送到需要资源的学校。在城市地区可能有政府提供资金的学

校，但在农村地区却没有，或者质量上可能相差很大。或者，如果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将其子女送入私立学校，则公共出资的学校可能不受重视。公共资源可能从初等教育转向为统治精英服务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完全转出教育领域，转入试图保护其利益的精英们支持的其他项目（例如军备建设）。

腐败是贫困国家的贫困儿童可能无法进入由政府提供资金的优质学校的另一原因：政府官员可能在开支于学校时躲躲闪闪，而热衷于支持花费巨大的项目，例如国防或道路建设，因为它们的资金更易挪用，并且这些项目更可能得到回扣。

外国捐助者（援助往往占贫困国家预算的很大比重）似乎也更喜欢资本支出，而不是经常性的学校开支，例如工资和课本。



用户付费的利弊

重要的是区分影响教育的需求和供给的因素。如果入学率低是由需求失灵引起的，与供给失灵相比，用户付费提高入学人数的可能性较小。显然，如果问题是因为政府缺乏财力或意愿来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办学或为学校配备人员，造成供给失灵，则用户付费是家长可以为子女提供教育的一种方法。当然，需求方影响使用户付费无效。如果在免费教育的情况下家长不愿或不能让孩子上学，那么，在他们不得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为教育付费时，他们不会送孩子上学。

然而，存在一个例外：用户付费可能提高教育质量，激发以前不愿为子女教育付费的家长付费。研究证实，如果用户付费导致学术和其他方面的改进，则它们会提高对教育的

需求。例如，当学校收费提高时，马里农村的入学人数起初下降，但是，在修建更靠近农村的新学校并且家长们意识到学校的质量提高后，入学人数上升，抵消以前的下降有余。

如果家长没有正确了解其子女教育的真正价值，因而需求不足，则用户付费可能具有“示范效应”：当用户付费可以使更多儿童上学、获得技能并最终找到工作时，这可能说服其他孩子的家长上学是值得的。

此外，如果要求家长为其子女的教育付费，则他们更会去监测教师的表现，从而确信他们的钱没有白花，从而建立良性循环。菲律宾的一项研究发现，更多依靠当地出资（来自市政府和对家长—教师协会的用户付费）的小学的效费比往往更高。用户付费通过把教育出资转到当地层次，可能改

乍得 用户付费实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仅215美元的中非国家乍得是缺乏产生公共收入的能力（总收入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净入学率严重不足（大约50%）、小学完成率很低（20%）、文盲普遍（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平均数令人消沉，但极端的地区和性别差异意味着对于许多农村儿童和女孩来说情况甚至更糟。

然而，乍得具有家长参与基础教育出资和管理的悠久历史。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存在由社区管理的学校。独立后，针对该国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以及政府未能向许多农村儿童提供甚至最基本的教育这一情况，家长协会做出反应，承担了管理农村学校的全部责任。这些协会不仅接管了政府遗弃的学校，而且还修建和经营新学校。在乍得的全部小学生中有20%在社区经营的学校入学。

家长还对政府经营的学校做出贡献。平均年度出资仅2美元

进学校管理。对当地社区（特别是对家长）负责的学校有更大的积极性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虽然腐败可能既在国家层次上存在，也在当地层次上存在。简单地说，家长监视当地官员并在需要时针对他们采取集体行动更为容易。最后，如果付费是自愿的，学校的表现不令人满意，家长可以让孩子退学，学校管理人员将失去作为他们自己工资来源的一些资金。

用户付费是克服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代价的对城市精英的政治偏爱的一种方法。它们使贫困家长能够直接为自己子女的教育付费，而不是通过其税收补贴富裕儿童的教育。虽然理想的情况是富人通过累进的税收补贴穷人的教育，但在现实中，往往出现相反的情况；用户付费可以防止这种不公平的结果。

左右，但家长还承担书籍和其他用品的费用，并出时间担任义工。入学是自愿的，但是，非正式的保险机制防止儿童被排斥在外，即使他们的家长无法支付不多的费用。

家长—教师协会雇用和监督乍得一半以上的小学教师，这些教师在受到最低培训后在自己的村子教书（在中心受到培训的教师很少愿意调到边远地区）。政府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支付其工资的80%（仅为政府雇用的教师所得的大约三分之一），社区弥补其余部分。

乍得的例子说明，甚至极端贫困的家长也可以对其子女教育予以重视。然而，尽管有他们的牺牲和合作，乍得的教育成果欠佳：受过6年或6年以上教育的成人只有不到一半可以流利地阅读。在资源缺乏、教师没有受到良好培训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做到这么多。政府承诺用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重债穷国倡议下腾出的资金和来自预计的未来石油收入的资金增加教育开支。与此同时，用户付费仍是使教育收支相平衡的唯一现实方法。没有用户付费，乍得儿童的情况会糟得多。

以用户付费为基础的教育改革甚至可能产生良性的政治循环。随着更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为自己寻求更多的民主参与并要求政府加强问责制。不难想像，在一些国家，这正是为什么现有政权反对会向所有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或任何教育）的教育改革的原因。

在由于偷漏税而没有对学校的公共出资的国家，用户付费可以恢复所付资金与所得服务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人们可能准备为上学付费，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钱换到了什么，但他们可能偷漏税，因为他们（恰当地）感到他们的税收将被腐败的官员挪用，不会流到学校。

虽说如此，用户付费并非万能药。公共出资并对用户免费的教育比家长付费的教育更加公平，并且，范围更加广泛。如果上学是强制性的，所要求的用户付费就是一项累退的税

马拉维和乌干达 超越用户付费

90年代中期，马拉维以免费初等教育取代了用户付费制度。虽然政府对初等教育的开支急剧上升，但是，由于入学率骤升60%（100万新学生），质量下降，导致过度拥挤和教师短缺。捐助方资金的拖延导致该国未能为入学率提高做好适当准备。教师的表现似乎也下降，因为家长去掉了财务负担，感到不那么迫于压力去监测教师了。另一方面，仍期望家长向学校建设出力、出物并购买学校用品和服装；这加上所放弃的儿童劳工的机会成本使总成本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很高。结果是辍学率上升。1999年，小学完成率仅为50%。性别偏见也持续存在。

乌干达在1997年完成了实现普及免费初等教育的大部分任务，当时它免除了每户不超过四个孩子的学费。同马拉维的情况一样，家庭仍负责学校用品并为学校建设做出贡献，还必须

收，也就是说，收入最低的家庭纳税的负担最重。在最简单的安排中，用户付费是每个儿童固定数额。这种付费占贫困家庭收入的比重比占富裕家庭收入的比重更大；按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贫困家庭的负担甚至更大。

虽然在无法得到公共出资的优质教育的情况下用户付费使家长可以为子女的教育提供资金，但是，入学自愿（即，上学视付费情况而定）可能导致一些家长不送孩子上学。一般而言，收费越高，家里越可能决定不让孩子受教育或被迫选择哪些孩子受教育。一些孩子可能因此不能受到教育。这样被排斥在外是不公平的。但是，另一选择甚至可能更糟；在政府不能或不愿提供免费教育的国家，如果没有用户付费，所有贫困儿童可能都得不到教育。

如果儿童因家长无法负担用户收费而不能上学，这种情

购买制服并支付最终考试费用。然而，在为新学生的涌入做准备方面，乌干达比马拉维做得要好。政府将用于初等教育的经常性政府开支的比重增加了一倍并利用外部援助培训新老师、修建教室和购买教学材料。即使如此，教育质量还是下降了，学生/教师以及学生/教室的比率很高，材料不足，净入学率从1997年的85%下降到2000年的77%。同马拉维的情况一样，性别偏见仍有报道。

这两个国家的经验表明，不能简单地通过免除收费和敞开教室大门就实现普及公共教育。需求方和供给方都可能出现障碍。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成本可能仍然高昂，因此阻碍入学，特别是在保持质量是一个问题时。反过来，保持质量不仅是增加开支的事情；良好的规划、执行和监测也是必要的。在这两个国家实现普及入学这一目标都需要采取措施，消除贫困家长与教育有关的全部成本，或许通过收入转移制度来实现这一点。

况不仅不公正并且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不公平，而且，它还可能在经济上低效。许多学校成本（例如有形的基础设施和教师工资）是固定的，多一个孩子上学不会增加这些成本。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一个老师、一个黑板、一间屋子的校舍十分常见。多一个孩子上这样的学校花费很小或根本没有花费。当然，在某一点后，质量会下降，因为教师的注意力要分给更多的学生。

原则上，政府可以通过监测用户付费学校的出资并豁免贫困家庭或以收入作为付费的基础，使付费成为累进的。然而，这意味着学校制度牵扯进政府的官僚政治，正是后者的缺陷迫使许多家长承担子女教育的责任。小社区在监测自己方面往往做得更好。成员往往知道他们的邻居的经济状况。他们相互掌握的信息可有助于保持个人化的用户付费制度的诚实，阻止那些可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寻求特殊待遇的人。社区联系因此可以为尚未充分发展的保险制度提供支持，使遭遇经济困境的家庭（例如，赚取收入者残疾）在邻居的帮助下可以继续送孩子上学，阻止自愿用户付费可能导致的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情况。

儿童有权获得免费的优质基础教育，这种教育不应取决于他们的家长是否愿意或能够为其教育付费，因此用户对学校的出资是在政府能够履行其责任之前的暂时解决方法。政府不应将用户付费的成功理解为说明它们被免除了这一责任。



结论

对基础教育的学生付费只应是暂时的解决方法：理想的安排和教育政策的适当目标仍是由政府从公共收入中提供出

资的普及教育。用户付费是不理想的，因为在上学是强制性的情况下它们是一种累退的税收。自愿用户付费是不理想的，因为如果家长不能或不愿支付学校费用，孩子就会被排斥在教育之外。

统计表明，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小学入学率和完成率很低，在这些国家资金短缺的预算、政府官僚机构的行政管理能力欠佳以及缺乏政治意愿（甚至还有对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政治反对）可能使贫困家长的孩子不能受到教育。如果家长等着政府做出改变，这种情况可能继续一段时间。在这种困境下，用户付费可发挥一定作用。

用户付费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儿童失学的原因是需求方的还是供给方的。如果儿童由于家长贫困、信息问题或对女孩教育的社会偏见所导致的需求缺乏而未上学，则不能预期实行用户付费会提高入学率，除非来自用户付费的收入使学校质量的提高足以克服需求方的障碍。

另一方面，如果问题是供给方的（也就是说，政府缺乏能力或缺乏意愿来提供公共出资的教育），则用户付费是解决未得到满足的对教育的需求的一种方法。在这些情况下，实际上，用户付费可能是在政府愿意或能够承担责任，向所有儿童提供他们有权得到的公共出资的免费优质教育前，低收入国家的家长向其子女提供教育的唯一方法。

经济问题丛书

1. *Growth in East Asia: What We Can and What We Cannot Infer*. Michael Sarel. 1996.
2. *Does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Matter for Inflation and Growth?* Atish R. Ghosh, Anne-Marie Gulde, Jonathan D. Ostry, and Holger Wolf. 1996.
3. *Confronting Budget Deficits*. 1996.
4. *Fiscal Reforms That Work*. C. John McDermott and Robert F. Wescott. 1996.
5. *Transformations to Open Market Operations: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Stephen H. Axilrod. 1996.
6. *Why Worry About Corruption?* Paolo Mauro. 1997.
7. *Sterilizing Capital Inflows*. Jang-Yung Lee. 1997.
8.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Fast?* Zulu Hu and Mohsin S. Khan. 1997.
9. *Protecting Bank Deposits*. Gillian G. Garcia. 1997.
10. *Deindustrialization—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1997.
11. *Does Globalization Lower Wages and Export Jobs?* Matthew J. Slaughter and Phillip Swagel. 1997.
12. *Roads to Nowhere: How Corrup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 Hurts Growth*. Vito Tanzi and Hamid Davoodi. 1998.
13. *Fixed or Flexible? Getting the Exchange Rate Right in the 1990s*. Francesco Caramazza and Jahangir Aziz. 1998.
14. *Lessons from Systemic Bank Restructuring*. Claudia Dziobek and Ceyla Pazarbaşıoğlu. 1998.
15.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Guy Debelle, Paul Masson, Miguel Savastano, and Sunil Sharma. 1998.
16. *Should Equity Be a Goal of Economic Policy?* IMF 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 1998.
17. *Liberalizing Capital Movements: Some Analytical Issues*. Barry Eichengreen, Michael Mussa, Giovanni Dell’Ariccia, Enrica Detragiache,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nd Andrew Tweedie. 1999.
18.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Lessons of the First Decade*. Oleh Havrylyshyn and Donal McGettigan. 1999.

19. *Hedge Funds: What Do We Really Know?* Barry Eichengreen and Donald Mathieson. 1999.
20. *Job Creation: Why Some Countries Do Better.* Pietro Garibaldi and Paolo Mauro. 2000.
21. *Improving Governance and Fighting Corruption in the Baltic and CIS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IMF.* Thomas Wolf and Emine Gürgen. 2000.
22. *The Challenge of Predicting Economic Crises.* Andrew Berg and Catherine Pattillo. 2000.
23. *Promoting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Learning What Works.* Anupam Basu, Evangelos A. Calamitsis, and Dhaneshwar Ghura. 2000.
24. *Full Dollarization: The Pros and Cons.* Andrew Berg and Eduardo Borensztein. 2000.
25. *Controlling Pollution Using Taxes and Tradable Permits.* John Norregaard and Valérie Reppelin-Hill. 2000.
26. *Rural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Mahmood Hasan Khan. 2001.
27. *Tax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Vito Tanzi and Howell Zee. 2001.
28. *Moral Hazard: Does IMF Financing Encourage Imprudence by Borrowers and Lenders?* Timothy Lane and Steven Phillips. 2002.
29. *The Pension Puzzle: Prerequisites and Policy Choices in Pension Design.* Nicholas Barr. 2002.
30. *Hiding in the Shadows: The Growth of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Friedrich Schneider with Dominik Enste. 2002.
31. *Corporate Sector Restructur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imes of Crisis.* Mark R. Stone. 2002.
32. *Should Financial Sector Regulators Be Independent?* Marc Quintyn and Michael W. Taylor. 2004.
33. *Educating Children in Poor Countries.* Arye L. Hillman and Eva Jenkner. 2004.

Eva Jenkner在基金组织研究支出政策问题和财政部门改革，她是基金组织西半球部的经济学家，为关于匈牙利、墨西哥和中东的基金组织报告撰写了有关财政政策的章节。她从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从普林斯顿大学Woodrow Wilson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获得公共事务硕士学位。



Arye L. Hillman担任以色列Bar-Ilan大学William Gittes经济学教授。1995年，他因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成为Max Planck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他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决策和政府及市场在促进社会和经济改进方面的作用。他最近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是《公共财政和公共政策：政府的责任和局限》（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他是《欧洲政治经济杂志》的编辑，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